

匪偽政權及「四屆人大」問題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六十六次學術座談會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六十四年一月廿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該所召開第六十六次學術座談會，討論「匪偽政權及四屆人大」問題。座談會由該所主任杭立武博士主持，應邀出席之專家學者計有郭華倫、王健民、柳鶴圖、項迺光、何雨文、洪幼樵、范植元、劉清波、裴孔淵、姚孟軒、陳森文、尹慶耀、周自強、遼耀東、張鎮邦、朱文琳、汪學文等五十餘人。茲按當日發言先後，將要點刊載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編者按：座談會紀錄係根據錄音整理，因時間匆促，付印前未經發言者校正，僅供參考，遺漏和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在此謹向讀者及發言者表示歉意。

杭主任致詞

中央電台在消息發表當天也請我發表意見，我曾把此次「人大」之召開比如婦女懷孕難產，醞釀了一年多，最後因內外形勢所迫，不得不勉強秘密召開，等於不得已而剖腹，生出來的是個雜湊的東西。若干國外人士因周恩來連任「總理」感到欣慰，實際上我們曾早說過周並不是「批林批孔」運動的目標。現在周仍有利用價值，而且毛澤東亦不便把他放在別的位置。也有若干國外報導認為周恩來在鬥爭中已獲勝，周恩來代表溫和派，甚至說江青派已失勢。以上看法都不正確，因為江青派已進入國務院，而周恩來在「人大」所提出的政策性報告，仍是以毛澤東政策為依據。為求得一個綜合性的研究，今天邀請各位專家學者來發表高見，希望對偽「四屆人大」的召開作一個深入的分析，並對今後大陸情勢的發展作一個探討。

裴孔淵先生：

毛共內部三大權力矛盾未獲解決

四屆偽人大會秘密召開草草收場

在討論四屆偽「人大」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就其背景作一瞭解。

四屆偽「人大」是毛共路線鬥爭權力鬥爭的一個過程，這一過程與毛匪

匪偽政權及「四屆人大」問題

安排後事的步驟是分不開的。

一般理解，以為毛匪安排後事就是安排接班人問題，其實它包括了三種意義：（一）是確立毛匪的路線；（二）重建符合毛匪路線的偽政權體制；（三）是培養能實踐並貫徹毛匪路線的「接班人」，使（一）（二）兩項獲得保證。

毛匪的急於確立自己所謂「革命路線」的決心，是由兩項因素促成的：

第一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變化。俄共於二十次大會以後，提出了「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全民黨、全民國家）的路線，馬列主義修正了，國際共黨陣營也多元化了。

第二是大陸內部反毛反共暗潮的澎湃。毛匪「三面紅旗」失敗，廬山會議迫使毛匪讓出了偽國家主席，退居第二線，匪偽的經濟建設在「調整」名義下後退，農村興起「三自一包」與「單幹風」，毛匪左傾冒進的政策幾乎全被否定了。

面對這樣的形勢和處境，毛匪及其一系展開了掙扎。對俄共進行了激烈的大論戰，以「天下大亂、反帝、反修、反各國反動派、暴力革命、階級黨、階級專政」來對抗「三和兩全」。對大陸內部則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呼籲，提出了下面這樣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點：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路線。」（一九六二年九月匪黨八屆十中全會毛匪講話）

上面這一論點，就是今天毛共所稱的「黨的基本路線」，也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毛匪為堅持並確立這一路線「安排後事」的念頭，愈到晚年愈為急切，他首先要求奪回上層建築領域（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權力，最後落實於廢棄一九五四年的偽憲法，重訂一個符合一己思想與路線的新偽憲法。

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匪這一願望的初步嘗試，打倒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表面恢復了毛匪個人的絕對獨裁，但客觀上却使毛匪成了被林彪利用的「打鬼的鍾馗」（毛匪致江青函），帶來了派系內部的新矛盾，以林彪為首的軍人勢力與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宮廷派）勢力之間，都趁毛匪安排後事的機會，爭奪接班的權力。

毛匪原來打算在毛共「九大」之後緊接着召開四屆偽「人大」，修訂新偽憲法，並送新的「接班人」到天安門去亮相，可是「九大」並未能解決毛

派內部的團結與路線問題，反而造成林彪集團的得勢，林彪的名字寫進了新黨章，林江兩集團由分裂而鬥爭白熱化。毛共九屆二中全會暴露了林彪集團奪權野心，使得偽「憲法修改草案」只能勉強獲得「基本通過」，四屆偽「人大」被迫延期，而毛林蜜月結束，最後爆發了林彪事件。

林彪事件以後，一方面是軍人權勢受到壓抑，一方面却是「文革後遺症」（王洪文語）的併發。毛共「十大」的召開，本想在「批林整風」基礎上收拾林彪事件的善後，使宮廷派能以準接班人身份算得黨權，使所謂「黨的基本路線」獲得全黨承認，從而緊接着召開四屆偽「人大」，解決偽政權體制和人事問題，但由於「文革後遺症」的依然嚴重，經過周恩來親口宣布過的四屆偽「人大」，一拖又是一年四個月。

從王洪文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央讀書班的報告」中，證明了「十大」以後「文革後遺症」的嚴重程度，他所透露的病象，仍然是毛共內部存在已久的三大矛盾：黨與槍的矛盾（宮廷派與匪軍實力頭目的矛盾）、新老幹部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是宮廷派與廣大老幹部勢力之間的矛盾）、偽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也是宮廷派與地方實力軍人及當權幹部之間的矛盾）。

「十大」以後，宮廷派為了鞏固已經篡奪到手的黨權，並排除繼續奪取軍權、政權的阻力，提早接班，發動了「反潮流」和「批林批孔」運動，口號與方式，幾乎是「文化大革命」的翻版。這之中有破有立，破者是以羣衆運動的作法來造成政治壓力，清除林彪集團的殘餘勢力，包括由毛匪一舉調動了八個大軍區的司令員，並全面批判當權者一切右傾保守觀念；立者是大樹特樹擁護宮廷派篡權接班的輿論聲勢和實力基礎，既建立羣衆性的理論隊伍，又建立城市工人民兵，符合了長久以來所期待的「文攻武衛」要求。

但「批林批孔」運動的後果也是嚴重的，嚴重到足以動搖匪偽整個統治基礎，這從匪黨中央「中發（一九七四）二十一號」文件就可明白：一是運動被反毛反共的羣衆所利用了，城鄉動亂再起；二是政治鬥爭已影響到了經濟，工礦減產，交通阻塞，年度經濟計劃不能完成；三是地方當權幹部又普遍遭批、鬥，各級偽革委會也陷於癱瘓。而表現於高層領導者則是周恩來稱病住院，江青、王洪文等以「國家領導人」身份的突出。在這樣的情況下，召開偽「人大」的口號就被擱置。

進入了去年下半年，毛共被迫收縮了「批林批孔」運動，在「深入、普及、持久」的口號下，將重心放在「學習與批判」上面；在處理現實情勢上，一方面號召「革命團結」，大量「解放」軍政老幹部，一方面號召「抓革命、促生產」，「大戰四季度」（十至十二月）。此一時期，表現於高層領導的是，毛匪從北平南下武漢滯留長沙，江青、王洪文等露面減少，周恩來雖然住院，露面則又增加。

這一情勢，說明了毛共上層力謀壓縮鬥爭、強調團結，以恢復一時之安，挽救經濟危機；而宮廷派的奪權已陷入低潮，不得不承認「歷史是螺旋形發展的」。

顯而易見，一年以前王洪文報告所透露的情勢，基本上並未改變；「文革後遺症」與毛共內部的三大權力矛盾，並未獲得解決；四屆偽「人大」是在既鬥爭又妥協的情勢下加緊籌備的，這一次的祕密召開，草草收場，原因在此。

張鎮邦先生：

新偽憲規定不設「國家主席」

提高黨權使連接黨政軍在一起

分析偽「憲法」，目前有三個文件，一個是一九五四年匪黨公佈的「憲法」，另一個是一九七〇年我敵後工作人員獲得的偽「憲草」，第三個文件是本月十七日匪黨公佈的「新憲法」。新偽憲是以原來的「憲法」為基礎的，主要不同的地方是序言改寫了，我們要比較偽憲，就應與一九五四年的「憲法」比較。但要逐條比較較難，因為原來的「憲法」冗長，條文多達一百零六條，現在的新偽憲較簡單，它打破一般憲法的常規，也打破一些共產國家憲法的常規。一九五四年的偽「憲法」主要是根據蘇聯憲法制定的，為了節省時間，簡單地將新舊偽憲的不同特點介紹一下：（一）舊偽憲規定國家體制為「人民民主專政」，新偽憲則規定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在專政方面，舊偽憲特別強調鎮壓官僚、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新偽憲特別強調鎮壓地主、富農、反動資本家、反革命份子、壞份子，這可能

就是毛共所謂的「新五類份子」。另外，在新偽憲中還強調社會主義時期的矛盾的長遠性。（二）舊偽憲提到「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新偽憲也提到「統一戰線」，但名稱則為「革命統一戰線」，統戰對象比以前縮小很多。一般研判偽政協會同時召開，但並未召開，可能已取消了。總之，統一戰線係共黨的基本策略，將來仍會繼續執行，但其內涵、範圍可能與過去不同。（三）舊偽憲未提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新偽憲則列入這些思想，做為毛共的理論指導思想。（四）新偽憲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字眼，此點為過去所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新舊偽憲最大的不同點，乃新偽憲在國家體制方面有很大的變動。新偽憲提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權力機關」，如此一來，政權成為黨的一部份，為黨直接領導的機構。在新偽憲中又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帥全國武裝力量」，軍權在黨的控制之下，黨變成了高高在上，黨、政、軍連在一塊，為新「憲法」的最大特點。（五）新偽憲規定不設「國家主席」，亦為一重要特點。（六）舊偽憲規定立法、檢察、公安權分開，新偽憲規定「檢察機關的職權由各級公安機關行使」。（七）關於人民自由方面，新舊偽憲都列舉一些，但新偽憲取消了舊偽憲規定的居住遷徙的自由，另又加上罷工的自由，根據張春橋的「修憲報告」認為此點為毛匪的觀點。這些自由有名無實，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陸人民，根本享受不到言論、出版、結社等之自由。總之，從總的方面看來，新偽憲在政權體制方面與舊偽憲截然不同，一九五四年的舊偽憲是由共同綱領發展而成，新偽憲與舊偽憲的連繫很少。

另一方面，可將新偽憲與一九七〇年「九屆二中全會」公佈的偽「憲法草案」做個比較，新偽憲是以一九七〇年的「憲草」為基礎的，只序言改變較大。大略說來，具有以下不同點：（一）序言經過改寫，刪除有關「毛澤東」及林彪的詞句，但並不表示毛匪在黨內的地位受到影響，因為過去毛匪與林彪連在一起，林彪詞句既經刪除，有關毛的詞句理應刪除。何況毛匪年已老邁（八十一歲），一旦死亡，則新偽憲又須修改。（二）過去講一般選舉，新偽憲則講協商選舉。偽憲草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軍隊和華僑選出的代表組成」，新偽憲則將華僑的字眼刪除。（三）原來偽憲章未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帥全國武裝力量」，新偽憲則加入這些詞句，為何加入，實在值得玩味。（四）偽憲草規定「軍、幹、羣三結合」，

新偽憲則刪除這些字眼，只剩下「老、中、青三結合」。大致說來，新偽憲與偽憲草的內容變動不大，只把毛澤東與林彪的字眼去掉。初步分析至此，請各位指教。

姚孟軒先生：

周匪報告繼續推行批林批孔

強調要加強「備戰」準備打仗

周恩來提出的偽政府工作報告，是根據新制定的偽憲法所確定的制度、政綱和各種基本政策的需要。其主要體現有下列三要點：

(一)新的偽憲法，它確定了黨統治的合法地位，把政權與軍權都直屬於黨的控制之下。因此，什麼人掌握了黨權，擔任了匪黨中央主席，他實際上就控制了政權與軍權。而今天的黨權，就掌握在毛澤東同其親信即一般人所謂的「文革派」的手裏。所以，憲法的修改，實際上也就是確定了毛澤東統治的合法地位；同時也爲了將來，把他的權力接力棒，傳給他培養的繼承人，創造了一個合法和有利的條件。今天，偽憲法的條文上雖有這些規定，但無數的實例足以證明，毛澤東的統治是不能得心應手，暢所欲言。他同「文革派」所掌握的黨權，在中央受到一些人的挑戰，無法使黨權貫徹到地方。所以，要使憲法的這些規定見於事實，尚需要一種艱難的努力。而周恩來的報告，很多地方都是爲了適應這個需要而制定的。

(二)偽憲法確定了「國家」的階級性質，它說明了「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規定了「國家」的權力機關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是以工農兵爲主體組織的。根據「公報」透露，「四屆人代會」出席代表，工農兵所佔比例是百分之七十，超過三分之二以上。「憲法」中把專制的對象也擴大了。周恩來的這個報告，在對內政策方面，就要體現它的階級路線，貫徹階級路線。

(三)偽憲法中把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也規定進去，根據「不斷革命論」制定了對內對外的基本政綱。周恩來的報告，就是要根據這些政綱制定當前的具體政策，使它能夠貫徹下去。

周恩來的偽政府工作報告，大致上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是把自「三屆人大」到現在，十年來的工作情況作了一個總結。這個總結，我們沒有時間來分析它，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他突出地說明，這是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路線的成就，而且特別肯定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左傾政策的成果。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了解它的背景，早在一九七二年春，中共即已公開地宣稱，「文革」期間的這些左傾政策，曾遭受一些人的挑戰和反對，那時有股潮流要恢復到「文革」以前的樣子。了解到這一情況，我們就可以知道，周恩來的報告中肯定了這些成就，是爲了替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的左傾政策作辯護。

第二部份，是提出對內對外的政策。就對內政策而言，有五個要點：

(一)繼續推行「批林批孔」運動。中共一面「批孔」，一面「揚秦」，「批孔揚秦」有三個重點：(1)批判孔孟的「仁政」、「德治」來提倡暴秦的暴力專政和暴力統治；(2)批判地方分權，強調中央集權；(3)批判中庸之道，強調鬥爭哲學。這三點都是毛澤東「不斷革命論」的三個骨幹。因此，周恩來報告中所提出的遵循「古爲今用」的原則，總結儒法鬥爭和整個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是表示毛澤東他要把他的「不斷革命論」在中國歷史上找一個根據，在中國傳統的思想找一個根據，對中國傳統文化掛上鉤。同時強調在鬥爭中學習馬列主義著作。從學習馬列主義的內容看，他也是要把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的權威地位。至於「批林」，在中國歷史上根本沒有所謂「林彪路線」，更沒有什麼所謂「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今天中共的所謂「批林」，除了要消除林彪的影響力以外，它還要把一切反對「文革」、否定「文革」一切左傾政策者，統統歸到修正主義，把這個罪名全部加到林彪身上。因此，「批林」並不是僅僅指林彪而言，而是指責今天中共黨內和大陸民間所存在着的一股反對「文革」的潮流。

(二)加強各級革命委員會的建設：怎麼樣建設呢？在思想建設方面，要加強他們學習毛澤東思想，要提倡他們所謂執行毛澤東路線的自覺性。在組織整頓方面，他提出來要培養青年的幹部、婦女的幹部、少數民族的幹部，特別是着重要從工人和「貧下中農」中間選拔幹部，參加各級的所謂「領導班子」，這就是貫徹「階級路線」。同時提出「老、中、青」三結合。實際上

也就是要逐漸地以新幹部代替老的幹部。根據很多資料看，在縣級以及縣級以下，新幹部在整個領導班子中，其人數的比例，有的在百分之二十幾，最多的到百分之三十幾，超過三分之一。這些新幹部，無論是婦女幹部，青年幹部，工人幹部，農民幹部都不是軍人，這亦顯示了一個傾向，那就是逐漸選拔文人幹部來取代地方上的軍人在黨、政方面所掌握的權力。很多事實證明，中共過去執行這個政策，在地方各級機構中，新老幹部都有尖銳的矛盾，尖銳的鬥爭。因此周恩來的報告中，特別強調要加強團結。在加強團結的項目中，特別強調要加強新老幹部的團結。

(三)強調「統一」同「團結」。團結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團結，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另一方面是社會力量的團結，爲了貫徹階級路線，規定依靠的人是工人同「貧下中農」，把其他的勞動人民和知識份子當作階級的後備力量來運用。在報告中提出「革命的統一戰線」，代替過去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這裡雖包括了各小黨派、外國人士、外國僑胞、港澳的同胞等等，但實際上，從「文革」開始，小黨派已經停止活動，除了每年國父誕辰時，所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招牌亮一下外，其他小黨派從來就沒有亮過招牌。今天改組以後的中共偽政權組織，國務院，清一色都是共產黨。過去小黨派還有幾個部長，今天一個都沒有。「四屆人大」，二十二個副委員長中，黨外人士只有三個，在一百四十多個委員中，黨外人士也只有十三個，所佔比例非常少。而在憲法中亦特別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有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選一點「愛國人士」作爲代表。因此從很多事實看來，中共的所謂「革命統一戰線」，已經不像「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時期那樣是一個政治的統一戰線，而成爲一個社會的統一戰線。周恩來的報告，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特別強調對海外僑胞的統戰和對台灣的統戰。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四)在經濟政策方面：周恩來報告中談的都是老調，但是有一點新的東西，提出十年之內建設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要在二十世紀之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個目標聽起來很動人，但是根據周恩來的報告，第一目標，是毛澤東在十年前就提出來，它要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完成，周恩來的報告，却把時間推遲了五年，他說從今年開始，十年內完成此一計劃。我們看，十年來，中共除了一九六五年較

穩定外，以後幾年差不多都在動亂期間，這個動亂對它的經濟發展影響很大。周恩來把毛澤東預期目標推遲五年，也同樣可以看出政治上的動亂對經濟方面的影響。將來周恩來開出的遠期支票是否能兌現，還要看大陸上的政治和社會情況如何來決定。

(五)強調要加強「備戰」，準備打仗。周恩來提出這個任務是緊接着國際情勢分析之後，沒有把它放在對內政策部份。他對國際形勢分析的結論是，認爲國際間戰爭，就革命的因素看，亦是贊成打。因此他提出此一任務並不是空話，而是應付當前國際形勢的需要。在軍事這面，他只講了一句話，要堅持執行「毛澤東的軍事路線」，加強軍隊的建設。就實際情形來看，軍隊中的「批林批孔」運動，現在還在進行，其目標有三：(1)消除林彪在軍隊中的影響力；(2)把軍隊納入地方黨委的控制之下，接受黨的「一元化領導」；(3)促進軍隊內部的團結，特別是軍中的政治工作幹部、軍隊工作幹部和新老幹部之間的團結。由此可見，周恩來的報告，還是要想方法解決軍隊的問題。

關於對外方面：周恩來對國際形勢的分析，還是天下大亂，而且是越來越亂。他特別強調，目前世界的經濟危機，促使世界的基本矛盾激化。矛盾的表現，其一是美蘇之間的矛盾，他認爲美蘇之間的戰爭因素在增長，總有一天要爆發戰爭。其二是美蘇兩霸同第三世界間的矛盾，這個矛盾，促使人民革命，人民革命的因素也是在增長。換句話說，中共對國際形勢的估計，認爲革命的高潮在逐漸成熟中。因此他的對外政策，也是根據此一認識而定的。周恩來報告中，提到外交政策的二個目標：第一要建立國際性的統一戰線，來進行新的「三反」鬥爭。所謂新「三反」就是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反霸權主義。第二是在處理國家關係方面，他還是強調和平共存。具體政策是，第三世界是今天世界革命的主力，所以要團結它，支持它在政治和經濟上的鬥爭，而且特別強調在經濟方面的鬥爭。也就是說中共要利用當前世界上的經濟危機，設法掀風作浪。另一方面，他特別提到韓國的問題、越南的問題、高棉的問題、寮國的問題、中東的問題同非洲南部的問題，他要輸出政治和軍事的暴力革命的方法，在這些地方作爲他鬥爭的重點。對第二世界，他明白的提出要聯合他們，反對霸權主義，就是反對美、蘇。對西歐，支持他們反霸鬥爭中的聯合；對日本，強調要繼續增進對日的友好陸鄰

關係。對第一世界的兩個國家，及對美、蘇的政策，對美國的政策，認為「中」美雖然存在着基本的分歧，但是仍然可以改善關係，只要「上海公報」所確定的各項原則能够認真執行。顯然，他對美一方面仍然要堅持他的原則和立場，另一方面他還是要用過去的笑臉攻勢來繼續對美勾搭。對蘇聯的政策，他表示原則性的爭論要繼續下去，但是仍然願意同蘇聯談判，維持「國家」關係的正常關係。總之，他的對外政策還是過去的兩面政策。他的兩面政策，一方面在國際事物上要反對美國和蘇聯，所謂「反霸」，就第三世界提出「反霸」鬥爭的幾個重點來看，除中東、西歐牽涉到美蘇兩國外，其他的一些地區特別是中南半島，亞洲的一些地區，直接的還是向美國的利益挑戰。因此在非共世界的「反霸」鬥爭，實際的鬥爭目標主要還是指向美國。另一方面在外交上對美要改善外交關係，要同蘇聯維持正常關係。一面拉，一面鬥的兩面政策，我們看他怎樣制定的呢？中共雖然認為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經成熟，但從雙方力量的對比言，他本身的力量還是屬於劣勢。今天的首要任務，就是要促使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把對方的力量由大變小，由強變弱。中共今天的這一套政策，就是促使力量變化的政策。以過去中共在大陸叛亂時期的政策作比較，可以說今天他的這個政策，就是抗戰時期對政府政策的一個翻版。

總而言之，周恩來的報告所顯示的，其對內對外政策的總趨向，基本上強硬的，是往左的，而且是玩弄兩面手法的。其次是，周恩來的報告，基本上貫徹了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而處處為毛澤東領導文化大革命辯護。在短短的五千多字的報告中，提到毛澤東、毛××的有二十六次。因此，目前國際上有些人認爲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溫和派的勝利，就周恩來的報告言，假定他是代表自己說的話，根本不是一個溫和派，假定他是把中共中央的決定拿來照本宣讀的話，也說明這個人只是中共中央政策的執行者。雖然這報告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但是他總是服從中共中央的意志，執行中共中央的左傾路線。所以說周恩來是溫和派的說法，就他的報告看來，是不能成立的。

范植元先生：

文革派在偽人大常委會佔優勢

而老幹部則控制了匪偽國務院

一、偽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人事

(一)偽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與三屆相同，仍由朱匪德充任。

偽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設副委員長廿二人，較三屆增加四人，原任三屆副委員長，連任四屆副委員長者八人，即劉伯承、康生、郭沫若、徐向前、賽福鼎、李井泉、阿沛·阿旺晉美、周建人。新任者十四人，可以分爲：(1)原來任職的機構已經撤消的老幹部五人，偽政權副主席董必武、宋慶齡。偽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張鼎丞，偽全國政協四屆副主席章國清、許德珩。(2)退職的偽國務院副總理四人，陳雲、聶榮臻、譚震林、烏蘭夫。(3)由三屆人大常委升任者二人，蔡暢、胡厥文，蔡的升任，相信原是李富春的遺缺，而胡是補充附庸黨派的名額。(4)代表「青」的文革派者二人，李素文、姚蓮蔚。(5)偽都所在地的市長一人，吳德（接代彭真）。

(二)偽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

由於偽憲法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以工農兵爲基礎，因此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與過去三屆均不相同，也是以工農兵爲基礎所組成。

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共一四四人，比三屆的九十六人增加四十八人。三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除蔡暢、胡厥文升任副委員長外，連任者僅卅二人，另二百十二人均爲新任。

初步統計，這些新任委員的背景是：工人廿七人，農民十八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六人，革命知識份子十人（包括文化工作者），革命領導幹部三人，軍隊幹部及士兵九人（包括「解放」的軍事幹部三人），老幹部十三人（包括「解放」幹部七人），原爲偽政協常委、委員、附匪份子改任者十四人，尙未能判明者十二人。

以上所說的工農知青份子，都是年紀輕（不到卅歲），而是從基層選出

的，如天津寶坻縣小靳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王作山，青島國棉六廠女工楊坡蘭，內蒙古師院學生龍梅，羽毛球運動員陳玉娘，河南鄭縣廣闊天地大有作爲公社的上下鄉知識青年薛喜梅等均可作爲代表。

(三)根據以上資料，個人對僞人大常委會有以下看法：(1)僞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除三數名年輕者外，其餘都是年老力衰，掛名而不能執行實際職務的人，根據統計，廿三名委員長、副委員長的平均年齡達七十二歲以上，其中八十五歲以上的四人，八十歲以上的三人，七十歲以上的十人，六十歲以上的三人，而最年輕的是李素文(四十二歲)和姚蓮蔚(四十歲左右)。(2)相反的僞人大常委會委員一四四人，四十歲以下的約有半數，這些人包括工、農、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革命知識份子、革命領導幹部，總共六十四人，如果加上尚未判明的十二人(絕大多數是工農份子)，那末共達七十六人，佔總數的一半以上。(3)上面的七十六人，如果我們認爲文革派所掌握，僞憲規定，僞國務院對人大及常委會負責，文革派控制了常委會，可以對僞國務院發生一定的制衡作用。

二、僞國務院人事

(一)僞國務院原有總理一人，副總理十六人，現設總理一人，副總理十二人，較原來減少四人。原設四十九個部、會(不包括直屬機構)，現設二十九個部、會，減少了二十個部、會。因此除去兼職者不列入計算外，僞國務院係由總理、副總理、部長、主任三十九人所組成。

(二)僞國務院總理，仍由周匪恩來擔任，副總理留任者僅鄧小平、李先念二人。其餘十人均爲新任，其中陳錫聯是軍人，王震、余秋里、谷牧是老幹部，張春橋、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大家都說他們是文革派，只有孫健身份不明，有人說他是負責財經工作的幹部，不過我個人認爲可能不是，因爲他當選十屆候補中委後，從未在北平出現，應該在地方工作。如果按工農兵的組成形式來看，孫健可能是兵，但還要資料證實。

(三)二十九名部長、主任中，谷牧、方毅、王靜在文革前即任現職。喬冠華、余秋里、李強、沙風、陳紹昆、李水清、康世恩、錢之光、鍾夫翔、劉湘屏、范子瑜等十一人，在僞四屆人大召開前，先後出任現職，劉西堯原任科教組組長，現調任二機部長，其餘葉劍英、華國鋒、李際泰、李成芳、邊疆、汪洋、徐今強、錢正英、萬里、葉飛、張勁夫、于會泳、周榮鑫、莊

則棟等十四人，則爲此次新任命者，此十四人中，葉劍英、李際泰、李成芳、汪洋是軍人，邊疆、徐今強、錢正英是老幹部，葉飛、萬里、張勁夫、周榮鑫是「解放」幹部，華國鋒、于會泳、莊則棟是文革派。

(四)根據以上資料，個人對僞國務院人事，有如下看法：(1)在過去僞一屆人大，僞政務院設卅六個部會，有十二名部長、主任是附匪人員，二屆人大，僞國務院設卅八個部會，有十名部長、主任是附匪份子，三屆人大，僞國務院設四十九個部會，有八名部長、主任是附匪份子，而此次新任部長、主任，都是匪黨人員，沒有一名是附匪份子。(2)僞國務院成員雖標榜老中青三結合，但實際上還是老的最多，中的次之，青的最少，根據初步統計，僞國務院成員三十九人中，七十歲以上三人，六十歲以上廿一人，五十歲以上十一人，五十歲以下的只有四人，如果六十歲以上爲老，那末老的佔二十四人，五十歲以上爲中，佔十一人，五十歲以下爲青，只有四人。(3)如按軍、幹、文來劃分，則老幹部佔二十人，軍人佔十人(包括孫健在內)，而文革派佔九人。

總的來說，僞四屆人大後，匪爲政權的人事安排，文革派在僞人大常委會佔有優勢，而老幹部則控制了僞國務院，軍隊還保持了一定的勢力。

郭華倫先生：

周恩來並不是一個溫和派
而是一個道地的激進份子

我想就一些國外人士對匪僞「人大」問題的若干看法，做一簡單的評述：

一、毛匪不出席的問題：僞四屆「人大」召開後，有的國外人士認爲毛匪似已失勢，我認爲並不如此，毛匪不出席可能有三個原因：(一)從過去的歷史看，毛匪有過避不出席被他認爲不適合他身份的會議，例如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延安鬥爭張國燾時，他要張聞天主持，他自己不出席這次會議，相反的，在某些場合還替張國燾說些好話，加以解脫。又如一九五四年鬥爭高崗、饒漱石時，他並未出席，他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來鬥爭他們。再如

一九七一年整肅林彪的情況亦同，在整肅林彪前他離開北平到各地巡視，一直把林彪整肅後，他才回到北平。(2)此次「人大」有關人事的安排及「憲法」的修正，一定在二中全会出現過激烈的鬥爭。鬥爭過程當中，他不適合出席會議。例如偽憲草中規定毛匪為「元首」，為「統帥」等字眼，現在要將這些字句刪除，要他出席把自己的名字取消，面子上過不去，也許刪除有關此等字句是他的意思。尤其有激烈爭執時，他最好離開北平，然後由他做最後的決定。(3)「人大」會場的安排亦不適合毛匪出席。此次「人大」係由朱德以委員長身份召開與主持，毛澤東要站在什麼地位呢？他不能與周恩來一樣，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坐在前頭。所以，若干國外人土認為毛匪不出席，已失勢，已變成一個傀儡、一個「孤僧」，已不起作用等等看法都與事實不符。我認為毛匪所說的他依然「大權獨攬」，而周恩來、鄧小平等所能掌管的，也不過是毛匪所說的「小權分散」的「小權」而已。

二、「人代會」與毛偽政權穩定性的問題：國外若干人士說：「四居人大」召開後，匪偽政權因此可以穩定下來。此可從兩個方面來看：(1)這是一次暫時妥協、表面團結的會議。也就是說，此次會議為匪黨現實鬥爭的結果。謀求妥協與表面的團結，以圖扭轉內外不利情勢。例如偽憲草中原規定毛匪為「元首」，為「統帥」，可是正式公佈的「憲法」，除把「毛澤東思想」一再強調列入外，這些「元首」等字眼已經完全取消，所謂「國家主席」也不設了，「元首」為誰？毛匪不是，誰都不是，而「中共中央主席」只是統率武裝力量。朱德在草案中的名份原是主任，身份更低。新偽憲則保留舊偽憲的「委員長」，委員長雖執行「元首」的職務，他有批准與廢除對外和約和接待國外元首等權力，但不稱為「元首」。由此可見這是經過鬥爭，經過妥協才出現的奇妙情況。(2)人事安排問題。不僅有所謂老、中、青三結合，有文革新貴，而且把被解放幹部都安排在偽人大常委會及國務院中，這顯然也是一種妥協。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正確，則大批被整肅的幹部便不應起用，這說明「文革」打錯了，解放被整肅過的幹部等於否定「文革」的「正確性」。諸位看：被整肅的幹部担任副委員長和副總理的有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鄧小平、王震等人，又如葉飛在「文革」時曾戴高帽子遊行福建各縣市，現在也做了部長，顯然，此種人事安排是經過鬥爭、妥協的結果。此種安排主要在造成一個團結的假象。實際上，「人大」以後新的鬥爭又

要開始，起碼又在醞釀之中。新的鬥爭的醞釀，可從幾方面來觀察：(1)軍人與黨幹間的矛盾尚未解決。「十大」壓制軍人，此次「人大」軍人參加者亦少，經過「八大軍區」司令員的調動，使得這些人對毛共心存不滿。所謂黨幹矛盾，地方與中央的鬥爭也將逐漸加劇，一元化領導難以落實。(2)「文革」幹部與老幹部、新解放幹部間的鬥爭又將重新燃起，誠如王洪文在「讀書報告」中所說的，被解放的幹部要報復，這種報復，如果不算利息，也要撈回本錢。(3)毛匪繼承權的爭奪勢將加劇。毛匪打算經過老、中、青的新陳代謝，一步步加以解決，但毛匪已老邁，來日無多。毛匪一貫把他黨內派系劃分為左、中、右三派（左為文革派，右為反文革派，中派似為軍人及地方實力派），他以左派作為接班基礎，可是其他派系必將起而爭奪，那是可以預料的。所有這些矛盾和鬥爭都將在肯定文革或否定文革與繼續「批林批孔」運動中暴露出來，既然周恩來在「政府工作」的報告中極力肯定文革的「正確性」，同時又強調「首要的任務是繼續開展批林批孔運動」，那麼，大陸內部的鬥爭，經過「人大」的暫時妥協與「團結」後，必將逐漸加劇，而所謂偽政權的「穩定」，最多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

三、周恩來是不是溫和派問題：由於周恩來繼任偽總理，好些國外人土便以為是溫和派的勝利，把周恩來視作溫和派的首腦。其實，周恩來在中共黨內從來不是一個溫和分子，而他本人從來也沒有自己的派系。從他個人歷史看，他是一個道地的激進分子。如果因為他玩弄笑臉外交，或在黨內做點協調工作，便視作溫和派，那就錯了。就以此次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來研究，也可看出中共和周恩來的嘴臉：(1)他的報告充滿了火藥味，他認為國際局勢是天下大亂，而且越來越亂，世界局勢沒有緩和，更沒有持久的和平，只有革命與戰爭，要準備打仗。(2)他認為美、蘇爭奪，總有一天要導致世界大戰，大戰不可避免，各國人民要有所準備，在他看來，戰爭對其有利，二次大戰建立了十幾個共產政權，他希望第三次大戰可能赤化世界。(3)堅決支持第三世界反帝、反殖、反霸，支持第二世界反超級大國，由「三反」轉為「二反」（反美反俄），縮小打擊面，利用矛盾，製造鬥爭及戰亂。(4)強調執行毛匪之「革命外交路線」，所謂「革命外交路線」即昆明軍區文件所指出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打擊少數，各個擊破。要把世界各國的矛盾收集起來，加以利用。并着眼於人民，寄望於人民，搞兩面手法——一面提

出「和平共處」，一面暗地裏搞顛覆活動。(4)強調與蘇修要長期鬥爭下去。又強調與美國關係可以得到改善。顯有聯美制俄作用等等。像周恩來這篇煽動戰亂，號召打仗的報告，怎能說他是一個溫和派？如果把中共聯美制俄的陰謀策略視作溫和，那麼，有一天正如周恩來所說，來一個相反的「聲東擊西」，那麼，美國政府與人民便要大上其當了。

項迺光先生：

共匪內部鬥爭互有長短

根據事實匪偽政權不穩

匪「四屆人大」之後，新的內部鬥爭展開，簡單分析如下。

一、文革派：文革派有幾個特點：(1)知識的貧乏：馬列主義知識的貧乏和對現代知識的貧乏。他們所看到的馬列主義的書均為毛匪所指定的幾本書，對其他好的社會主義的著作均一無所知。對現代知識的貧乏，包括一切自由主義思潮及生活上、物質上的知識的貧乏。(2)作風的囂張：認為自己是天下的主人。(3)羣衆基礎薄弱：羣衆組織在一定的任務內聽從文革派的指揮。文革派是利用黨的支配權力來運用羣衆，這種運用有限度，估計文革派的羣衆基礎要分階段、分任務、分表面與實質來看。(4)毛的親信：用以體現毛的路線。元老或高級幹部容忍文革派基於此一特點。(5)年青：來日方長，是文革派佔絕對優勢之處。

二、軍隊及黨政幹部：這一批人，有能力、有幹勁、有經驗，約五、六十歲，目前是毛匪的核心幹部，彼此在對付文革派的立場上，互相團結，以謀自保。

三、林彪事件對軍隊衝擊大：林彪事件後，從批林整風到批林批孔都是以軍隊作目標，天天叫黨指揮槍，就是要控制軍隊，却始終沒控制住，林彪事件後，沒有一個被整肅就是軍隊本身有了團結，軍隊派系因林彪事件而沖淡。

由此而知，中共內部鬥爭各有長短，中共政權的不安，並非我們主觀推測，而是根據事實。

匪偽政權及「四屆人大」問題

王健民先生：

毛澤東一向以個人獨裁為主

此次偽新憲仍能達成獨裁目的

毛澤東一向以個人獨裁為主，六屆六中全會時否定了各次大會的領導，第一次表現出個人獨裁的作風，「七大」舉行時亦如此，「八大」後，毛澤東漸不得志，地位不穩，乃發動文化大革命，欲排除異己。此次「四屆人大」的新憲法仍以個人為中心，以黨領政，黨的領袖統率一切，毛為黨的領袖，故仍能達成其個人獨裁之目的。他如此做，一部份安排其身前，一部份為安排其後事，免如史達林死後遭清算。文革派為其親信，毛澤東希望他們掌握政權，但一時不能如此，故目前不得不喊出老中青三結合。

曾永賢先生：

匪文革派要抓軍權很難做到

內爭加劇恐怖統治勢必加強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先生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本人完全贊同。我只想提出兩項意見，作補充。

第一、這次修改的偽憲中，明文規定匪黨組織和匪黨中央主席對匪偽政權和匪軍的領導地位，是其最大特點之一。例如在偽憲中通過如「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領導」(第二條)、「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民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子弟兵」(第十五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第十六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提議，任免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的組成人員」(第十七條)，同時還把「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定為「人民的權利和義務」的頭一條(第廿六條)等

等規定，企圖把匪偽政權成立以來行之已久的「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體制，加以鞏固起來，使其「合法化」，並為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掌權作組織佈署。

這種「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可以說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備條件之一，在「文革」以前，執行的比較徹底。可是，自文革以後却難於實現「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及其原則。從整黨建黨以後，匪黨不斷強調「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企圖恢復文革前的領導體制，但是截至目前為止，黨政之間、黨軍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與對立情形仍甚為嚴重。在文革後為何無法實現黨的「一元化領導」？其主要原因有三。一為原有的、較為健全和鞏固的匪黨組織，經文革初期的「造反」而被摧毀，連原有的「黨的威信」和領導權威也一併喪失殆盡。雖然經過整黨建黨運動，重建了匪黨組織，可是它所喪失的「威信」和「權威」却一去不復返。二為「造反有理」和「反潮流」的口號，導致了對現有組織及領導人的不滿與反抗。例如王洪文所說「反領導就是反潮流」的認識和行動是非常普遍的，從而鬆懈了對「黨的領導」之無條件服從。三為目前掌握匪黨中央領導權的、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缺乏領導威信，無論其黨齡、鬥爭經驗、領導能力，均無法使人信服。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偽憲中對匪黨的領導地位有多項規定，但是要真正達到其「以黨領政」、「以黨領軍」的目的，却不是簡單的事。尤其是在毛澤東死後，沒有毛匪撐腰的「文革派」，如果沒有軍方勢力的支持，則決無法繼承毛匪領導權，偽憲中的有關黨的領導地位之規定也會落空的。因為所謂「黨權」，如果沒有「軍權」的支持，還是空洞的。從毛匪建立其領導權的過程來看，是先掌握軍權而後才能掌握黨權的；他如果不是牢牢地掌握軍事領導權，文革的奪權是無法達成的。又如劉匪少奇雖然以「第一線」領導人的身份掌握了黨權，但是因為缺乏匪軍的支持，所以輕而易舉地被毛林勢力打垮。再如史達林死後的俄共黨權是由馬林可夫所掌握，可是黑魯曉夫很巧妙地取得了代表軍方勢力的朱可夫和布爾加寧的支持，而把馬林可夫打倒，取得了俄共領導權。這些事實說明了軍權的重要，以及「黨權」與軍權的關係。

近幾年來，「文革派」也積極地企圖在匪軍中發展其勢力，但是其結果并不如意。例如通過李匪德生的這條路，已經走不通了，從這次大會公報所

發表的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排名情形看，李匪的匪黨中央副主席和匪黨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可能已被剝奪；王匪洪文在去年元月十四日「中央讀書班」的報告中主張要派三十多歲的人去當一級軍區司令，但迄今尚未見實現。由此可見，文革派要抓軍權是很難做到的。文革派既沒有軍權的支持，它所掌握的匪黨中央領導權也是空洞的、脆弱的。

第二、這次偽憲中，「行政權」的擴大是其另一特點。例如：第二十五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各級人民法院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設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各級人民法院院長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關任免」。在原有偽憲中的規定是：「縣級以上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並且有權罷免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第五十九條）。由於偽法院的工作，必須向本級偽人大會常設機構負責和報告，事實上把司法權隸屬於行政權之下。

此外，這次偽憲取消了檢察機構，規定「檢察機關的職權由各級公安機關行使」（第二十五條），把原有的所謂「公、檢、法」三位一體的專政體制加以改變，加強了偽公安機關的職權。同時，在人事安排上，由「文革派」份子華匪國鋒（匪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出任偽國務院副總理兼偽公安部長，以便加強專政鎮壓和消滅異己。這也是「文革派」擴張勢力和奪權的重要棋子。在這種情況下，今後其內部鬥爭勢必加劇，其對內恐怖統治勢必加強。

趙先運先生：

「四屆人大」是勉強召開的

暫時的妥協終必發生鬥爭

本人就毛共最近召開的「四屆人大」，提出下列幾項報告：（一）大會的情況，（二）「四屆人大」的召開與「批林批孔」的關係，（三）張春橋的修改「憲法」報告與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的比較。

（一）大會的情況：

○會議的召開是非常秘密、匆促、簡單也可以說草率。十年來召開一次大會，應該是隆重的、公開的舉行，但是它採取的是秘密而草率的形式，就大會本身而言是一個不正常的情況。而且這個會從五日到十一日召開了一個預備會，討論主要的情况、問題和專門工作，到十三日至十七日才正式開會。十三日張春橋、周恩來作了報告，十四日開始討論，十五日「人民大會堂」出殯，給李富春開追悼會，十六日「公報」上沒有交代，十七日就閉幕。在「四屆人大」會期間，加上一個追悼會，可以說是一種反常的情況。

◎毛澤東沒有出席「十屆二中全會」，也沒有出席「四屆人大」。不出席「四屆人大」，我們可以說他沒有適當的身份，但是黨主席不主持「十屆二中全會」這件事，本人覺得很反常。我們從「四屆人大公報」看，不知道誰主持會議。毛澤東在九日那天，在長沙接見了外賓，十六日又接見外賓，亦是在長沙，可見毛沒有參加會議。「十屆二中全會」，黨主席不參加，可以請別人代替，那麼大會公報假如說某某同志受毛指示主持這個會，這樣接班人的地位當然可以確定。事實上這個會議一定有人主持，而主持人不能說出來，以免發生討便宜。所以我們由此可見「十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內部絕對有鬥爭。那麼「四屆人大」我們說毛沒有適當身份主持會議，但是它在黨領導之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至少在公報上要加一句「這個會是在毛××懷心之下召開」的，然而，「公報」上連這句話都沒有。本人認為「公報」上省略這句話總是一個反常的現象。

◎在「四屆人大」公報上，看到毛澤東個人名字的只有一次，其他提到很多毛澤東都是加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路線。人民大會堂上掛了毛澤東像，「公報」上假使不仔細看，看不到毛澤東的名字。加上「十屆二中」全會他沒有主持，以後讀歷史的，研究「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人大」會的，恐怕認為毛澤東已經死了。因此，這個會本人總覺得有問題。

(一)「四屆人大」的召開與「批林批孔」的關係：

從「批林批孔」運動的背景看「四屆人大」，本人覺得這一會議也是非常反常的。「批林批孔」運動的發展是從「十大」以後，即一九七三年八月。發展有二條線，一條是思想鬥爭，另一條是現實鬥爭。第一階段是思想鬥爭，中共「十大」閉幕，做了幾件事：一、「四屆人大」在那時就延期召開；二、中共中央辦讀書班，由王洪文作報告，提出「批林批孔」的目的；三

、開始組織城市民兵；四、各級黨委會成立「批林批孔」辦公室；五、在思想方面把「批孔」同「批林」結合，成為「批林批孔」運動。去年二月一日，「批林批孔」運動公開，到四月落實到現實鬥爭，大字報出現，鬥爭開始。到七月，在現實鬥爭戰線上也發生了幾件事：一、毛澤東在七月下旬離開北平，在「批林批孔」緊要關頭，毛離開北平，不管他離開北平作何活動，但是總離不開與「四屆人大」有關。「四屆人大」開了，是這樣的局面，這就是毛澤東半年多來離開北平策劃的結果。二、八月發現共匪內部有召開「四屆人大」的口號出來，到今年元旦，「兩報一刊」社論又不提了，過了幾天「四屆人大」召開。這種反反覆覆的情況，我認為「四屆人大」的召開是非常勉強、不正常的。

(二)張春橋的修憲報告與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之比較：

張春橋與周恩來都強調「批林批孔」運動，但強調的重點有所差別。張春橋強調現在所有制改革完成，但是有一些機關資產階級當權，「孔老二死了兩千多年，無產階級的掃帚不到，這類垃圾決不會自動跑掉」，這是在制度上談問題。周恩來談「批林批孔」，是批判「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總結儒法鬥爭和整個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等等，與「國家」存在着的現實制度無關。這兩個報告，都是經過中共中央和「四屆人大」通過，當然不會有大問題，也許是黨的報告是強調「抓革命」，政府工作報告是強調事務性的東西。不過周恩來的報告也有經濟衝擊政治的嫌疑。從「四屆人大」新聞公報看，關於經濟任務方面也很少談。因此，本人認為對這個問題有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其次是從毛澤東與周恩來所處的形勢來看，周恩來住醫院，醫院成了辦事處；毛澤東住在長沙不回北平。這樣是不是有兩個司令部呢？因此，毛周的關係問題，也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

總之「四屆人大」這個會是勉強召開的，是暫時妥協的結果，今後還會

有鬥爭。

何雨文先生：

共匪公布的偽憲並不是憲法 毛匪沒有出席是怕引起鬥爭

我個人的感覺，總認為今天中共所公布的「憲法」並不是憲法。在我們的觀念憲法是保障人民的權利，限制政府的權力。像中共這樣的「憲法」即使在蘇聯或其他共產國家也沒有出現過。所以從學理的觀點看它不是憲法，完全變成黨的東西，政權成了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

「人代會」是最高權力機關，最高權力機關上還有共產黨領導，這樣，「人代會」就不是最高權力機關。「人代會」代表也不是選舉產生，只是高階層經過協商之後產生出來。中共四屆「人代會」是秘密召開的。按照中共以前規定，在「人代會」召開前二個月就要把選舉代表的工作完成，公布被選人名單。根據一些資料顯示，軍人代表的產生比較困難。這次會議是在各方面協商、妥協之下召開的。

毛澤東不出席會議的原因很多，本人認為最大的原因是會前，會後，乃至大會期間有鬥爭，尤其是在有關毛澤東思想路線一方面。從周恩來和張春橋的報告中可以看出，許多路線還是沒有肯定。因此毛澤東怕出席以後，碰到像彭德懷、陳伯達這樣的，會使他更難堪。由於以前的教訓，他不敢出席，可見鬥爭沒有結束。

就人事分配方面而言，也是一種妥協。以往黨內「毛主席、毛主席」提得很多，現在避免，如果把毛澤東提得太高，自然削弱了黨的地位。因此這次憲法上用「黨」字，這一定是經過黨內同意，共產黨地位提高，權力擴大。這樣做，黨內的人當然高興而願意通過。如果特別強調毛澤東，恐怕黨內不同意，這一點證明毛澤東作了很大的讓步。中共這次的人事安排，顯然是一個分贓的東西，當然「文革派」也佔了一部份權利，特別是華國鋒，擔任公安部部長職務，真正的得到權力。其他各派都有得有失，是妥協分贓的玩意。總之，鬥爭沒有結束。

劉清波先生：

把黨的地位和政府結合在一起

是匪偽「新憲法」的特點之一

有關中共新「憲法」的全文尚未看到，現只能就廣播中所聽到的發表幾

點個人的感想：

(一) 歷史淵源：目前世界上有一百四十多部憲法，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一為民主國家的憲法。而中共的「憲法」屬於前者，亦即共產主義的憲法。中共建立政權後，有四個代表性的文件可供參考。即一九四九年的「共同綱領」，一九五四年的「憲法」，此兩文件一般人批評其形態和實質為一九三六年史達林憲法的翻版。第三個文件為一九七〇年的「憲法草案」，第四個文件為本年度一月十七日通過的「新憲法」。原則上，中共「憲法」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四個文件均為世界各國所承認。

(二) 黨的地位：據一般英國學者的研究，把黨分為兩類：一為Inside Party，一為Outside Party。前者指黨和國家體制結為一體，總裁為黨魁，議會中的議員均為黨員；後者指黨與政府不協調，黨在政府之外。中共新「憲法」把黨的地位和政府結合在一起，為其特點之一。

(三) 國體：即社會主義國家，採取集體所有制。此點與一九五四年有些不同，一九五四年的「憲法」規定生產資料所有制有下列數種：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勞動羣衆集體所有制；個人勞動者所有制；資本家所有制。而「新憲法」僅有兩個所有制，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羣衆集體所有制。

(四) 厲行無產階級專政，全面專政化，包括進行階級鬥爭。個人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階級鬥爭是常態，他們認為階級鬥爭是推行政策的方法。

(五) 國家元首：一九七〇年的偽憲草及一九七五年的新「憲法」的最大不同點是第二、十一、十五條。第十八條未改，但從十五條規定黨主席領三軍，毛為實質的「元首」，朱德為「人大」常務委員會的委員長，成為形式上的「元首」。

(六) 國務院組織的變動：文革前國務院有四十九個部，二十四個署、會、局，現在的重工業部由第一—第七部都未變動，且偏重於尖端科學的發展。

(七) 地方制度：更改原來的地方制度，成立革委會。

(八) 民權方面：關於民權方面未有太多修改，罷工自由在一九七〇年的「憲草」中就有，「新憲法」規定十一種自由，十二種權利。權利、自由規約如此之多，實際上不可能，因為共產主義國家中有十四部憲法，無一部不

規定自由與權利，而人民權利的兩大基礎是財產及參與政治，毛共厲行無產階級專政，政權只限於無產階級，實行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財產歸公，人民沒有財產，此兩大基本權利全被剝奪。因此，很多權利等於沒有權利。充其量只是宣傳而已。例如聯合國成立時，史達林要求羅斯福總統讓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成爲聯合國會員國，羅氏反對，史達林則列舉憲法中所規定的諸多權利與義務，羅氏無言以對，頓然羅氏被唬住了。

(四)過去世界各國學者對於憲法的評價不同，現在引用一位具有權威地位的學者羅恩斯坦(K. Lowenstein)的看法來評論毛共的憲法。他把憲法分爲三類：一、規範性憲法：即法律公佈有實效、有法效，足以保障人民權利，一般先進的民主國家屬於此類。二、名義性憲法：有法律的法效，但無法律的實效，能否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則大有問題，一般發展中的國家屬之。三、巧語性的憲法：即權力所有人(Power addressees)沒有權，權力持有人(Power holder)是其個人意志的表現。中共憲法係「毛澤東思想」的具體化，屬於此類，正如中國成語所說：「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陳澤民先生：

鬥爭仍將繼續文革派可能分化

鬥爭情形與毛周生死存亡有關

僞「四屆人大」召開後，對文革派有得有失，如果假以時間對文革派有利，但究竟能有多少時間，實在值得懷疑，毛匪尚未能安排好他的後事。文革派急於奪權，但未能如願以償，不能完成全面奪權的基本原因有幾：(一)文革以後的「批林批孔」運動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原來想從思想上整風，發展到政治上的整肅，這個企圖從匪黨中央所發佈的一連串文件可以證實。然而由於文件內容平凡、空洞，不但不能爲一般幹部所接受，也不能爲一般羣衆所接受。除非發起類似文革的羣衆運動，但此舉必會造成大亂，文革對其教訓已够多了。因此，匪黨不得不懸崖勒馬，結束批林批孔，把它轉移到普遍深入持久方面。(二)新老幹部的反抗，我們應從老、中、青三個概念着手。老、中、青三個概念係政治概念，並非字典裏的概念。所謂「老」是指匪黨成

立以後的幹部，「中」即從抗戰暴亂到僞政權成立初期的幹部，「青」是從三面紅旗及文革後冒出的青年幹部。代表文革派的「青」是毛培養出來的新生力量，有一定勢力，此點不可否認。老雖有影響力但不多，除鄧小平外，其他都老了，如朱德、董必武等人。起重要作用的還是中間力量。而文革派最大的阻力還是「中」這一部份，文革派奪權鬥爭未能成功，乃受「中」這一部份的影響。根據一般的看法，「老」帶「中」，「中」帶「青」，文革派想奪權，「中」不服，「老」也不滿。(三)軍隊的問題：文革派想奪權，必要奪政，要奪政必先奪軍，王洪文的讀書報告，主張軍區司令要由三十歲的人擔任，江青在軍隊中的活動，都可看出文革派的企圖，但都未成功，軍權仍在毛匪手中，根本原因乃軍權不可轉讓，戰爭的理論是流血的經驗，軍權要流血達成的，並非掛名即可，葉劍英年已老邁，也僅止於掛名而已。所以文革派不易奪得軍權，毛匪也不能把軍權轉讓給文革派。(四)此次「人大」毛匪雖未出席，但僞憲仍然貫徹其意向及精神，他一定同意僞憲，所以他不但未失權，其權力反而增加。(五)今後鬥爭仍將繼續下去，文革派可能分化，鬥爭的情形與毛、周的生死存亡有關。

杜龍潭先生：

匪黨中央直接控制國家軍政大權

文革派控制黨政軍特務武裝力量

這次共匪四屆人大通過的僞憲，關於軍隊問題，完整的條文是第十五條，規定「人民解放軍和民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子弟兵」，併列爲僞國家武裝力量，「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即黨的主席爲全國全軍最高統帥。而軍隊任務，仍然規定是「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保衛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等等。

另外在第十七條中，雖然規定僞國家機關是「人民代表大會」，但實權則操之在黨中央，對僞國務院總理和組成人員，包括僞國防部長的任免，都要根據黨中央的提名。在第二十六條中，仍然規定實行僞民役制。

以上由黨中央直接控制僞國家軍政大權，這是新的僞憲最大的特點，毛

澤東能以輕描淡寫的手法，解決了鬥爭以久的偽國家體制和權力問題，關於這一點，張春橋在其修憲報告已經透露，是藉「加強黨對國家一元化領導」，是藉「人民解放軍和民兵，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從而貫徹毛澤東一貫的「軍事無產階級專政」。

關於偽國家武裝力量，一九五四年偽憲，是以「人民解放軍和公安部隊」為偽國家武裝力量。這次偽憲改列民兵，不列公安部隊，并非因公安軍被裁撤，而是要突出民兵。突出由地方黨委所控制的槍桿子的政治地位。這個由地方黨委控制的槍桿子，數量非常龐大，就各戰略地區的城市武裝民兵而言，都超過各戰略地區人民解放軍的數量若干倍。這說明另一事實，即共匪的民兵，將對人民解放軍發生一種制衡的作用。

共匪公安部隊迄今仍然是存在的，不論轉屬於軍事系統的海邊防衛部隊，或隸屬於行政系統的武裝保衛部隊，都受偽公安部統一領導。這次以華

主席結論

一、毛共第四屆人代會乃是經過鬥爭，一種妥協的安排，以造成假團結並謀求暫時的安定。二、此次通過的新「憲法」是一部不倫不類甚至於矛盾雜陳的文件，它高舉「毛澤東思想」，確定「不斷革命

論」為政策的依據，沒有任何民主氣息，可以說是一部階級專政暴力統治的憲法。三、它確定並提高黨權，規定「國務院

「代表」人民政府」向「人代會」負責，「人代會」又向黨負責。結果形成一黨專政。四、在人事安排方面，表現老中青

各種勢力的湊合。周恩來雖然仍然擔任「國務院總理」職位，只是在執行「毛澤東思想」路線的情形下，才能維持地位。

文革派勢力進入國務院並把持公安部。五、文革派與軍人維持暫時和平共處的局面，軍方實力派人物互相團結，共同抵制

文革派奪權的野心，以求自保。六、由於元老派、文革派、反文革派、軍人與地方實力派之間矛盾重重，老、中、青各級

幹部表現於批林批孔以及文革成果肯定與否定上，新的內部鬥爭即將展開。七、對外政策而言，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

線，以「和平外交」與「和平共處」作為宣傳欺騙的手段，實則與滲透顛覆交互運用的兩種奪權的策略的表現。八、毛匪

澤東雖未出席「人大」，但並未影響毛首在毛共中的領導地位，尤其毛首掌握黨權和軍權，可以說仍是大權獨攬。九、周

恩來偽善的面目並非代表溫和派，從其在「政府報告」中提出的政策路線，他仍然執行毛澤東路線，呼籲第二世界與第三

世界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共同反美反俄並再號召準備打第三次大戰，以天下大亂為好事。十、人代會並未解決繼承問

題，今後的鬥爭將仍然繼續下去，人代會的召開並未解決文革後所產生的矛盾，就矛盾的形勢和實質而言仍未改變，因此，人代會的召開又象徵着新的鬥爭的開始。

國鋒任偽公安部長，說明共匪黨政軍各個系統的特務武裝力量，都控制在文革派如康生、汪東興、華國鋒之手，由此可以瞭解毛澤東對文革派培植，仍然在繼續貫徹他的「威略部署」。

再就共匪軍隊任務而言，自它建軍以來，并無重大改變。雖然規定軍隊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工具。但軍隊的政治地位一向甚高，它同時負有建黨整黨的任務。因此也就養成了軍隊對黨對政治過敏的性格，這種具有戰鬥性和政治性的軍隊，如果一旦黨或政治發生問題，軍隊便形成一種特殊的權力中心。這是共匪軍事無產階級專政的強點所在，也是它最具危險性的弱點所在。而這種危險性，并且是隨時都可能發生的。不過，從這次偽政府人事安排情況來看，是採取四平八穩的，各軍系老幹部都全盤照顧到，都安排職位，甚至將來對偽國防部內部人事安排也是這樣，其作用在減少對軍隊的刺激。